



古代公文研究

丁晓昌 冒志祥 等◎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古代公文研究

丁晓昌 冒志祥 等◎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G279.29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公文研究/丁晓昌 冒志祥 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396-1973-2

I. 古… II. ①丁… ②冒… III. 公文-研究-中国-古代
IV. K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933 号

古代公文研究

丁晓昌 冒志祥 等著

责任编辑:葛永波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9.25

插 页:2

字 数:474 000

印 数:1 200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73-2/I·1841

定 价: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古代公文研究

主 编 丁晓昌

副主编 冒志祥

撰写者 郦 波 曹红军 丁晓昌

冒志祥 孙书磊

总 序

随园,是清乾隆时期著名文学家袁枚的故居。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恰好坐落在随园旧址大略所在的那一片山丘及其附近的旷地。校区内古木参天,芳草茵地,鸣禽时变,檐翼欲飞,风景之清幽美丽,俨然是一座道地的南国园林。因此,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上也将南师校园称作“随园”。

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之一,又是我院“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骨干学科,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带头学科。本学科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涵括古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论等各个门类,从先秦直至晚清等各个时代,诗文、词曲、戏剧、小说等各种文体,覆盖面甚广。其中唐代文史研究、词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建国以来,本学科曾经拥有唐圭璋、孙望、段熙仲、诸祖耿、吴调公等著名学者,出版过《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元次山年谱》、《水经注疏校点》、《战国策集注汇考》、《李商隐研究》等高质量的著述。他们不仅以自己严谨的学风、精深的知识为本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亲手培养了几代教学与科研人才,催生

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教学与科研成果,诚所谓“新笋已成堂前竹,落花都入燕巢泥”。

为了不断地向学术界介绍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增加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我们决定精选本学科教师在古代文学之文献与理论研究方面的优秀著作,编为这套《随园薪积丛书》。所谓“薪积”也者,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有取于《史记·汲郑列传》“积薪”而“后来者居上”之喻,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不断提高学术品位,提高学术价值。

第二,有取于《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之喻。教师是“薪”,学术是“火”,“薪”尽而“火”传。我们的物质生命不免于毁灭,但精神的生命却可望凭藉学术著作的流传而达到永恒。有冀于此,我们期待本学科的同仁将自己的“随园魂”融入这套丛书,使她真正成为我们精神生命的累积!

《随园薪积丛书》编委会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先秦公文

- 第一节 公文的起源 (23)
-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公文 (27)
- 第三节 《尚书》 (39)
-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文 (46)

第二章 秦汉公文

- 第一节 秦汉公文的撰制机构和人员 (68)
- 第二节 秦汉公文制度 (70)
- 第三节 秦汉公文文种与格式 (74)
- 第四节 秦汉公文发展简史 (79)
- 第五节 秦汉公文的主要内容 (101)
- 第六节 秦汉公文的撰制技巧 (122)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公文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撰制机构及人员 (136)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种类 (141)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制度 (144)
-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公文发展简史 (149)
-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内容 (162)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撰制技巧·····	(183)
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理论·····	(191)

第四章 隋唐公文

第一节	隋唐公文撰制机构及人员·····	(209)
第二节	隋唐公文的种类·····	(219)
第三节	隋唐公文制度·····	(227)
第四节	隋唐公文发展简史·····	(242)
第五节	隋唐公文内容·····	(257)
第六节	隋唐公文撰制技巧·····	(303)

第五章 宋元公文

第一节	宋元公文撰制机构及人员·····	(336)
第二节	宋元公文种类·····	(346)
第三节	宋元公文制度·····	(353)
第四节	宋元公文发展简史·····	(369)
第五节	宋元公文内容·····	(395)
第六节	宋元公文撰制技巧·····	(409)

第六章 明代公文

第一节	明公文撰制机构及人员·····	(421)
第二节	明公文种类·····	(429)
第三节	明公文制度·····	(435)
第四节	明公文发展简史·····	(448)
第五节	明公文内容·····	(470)
第六节	明公文撰制技巧·····	(482)

第七章 清代公文

第一节	清公文撰制机构及人员·····	(493)
第二节	清公文种类·····	(502)
第三节	清公文制度·····	(509)
第四节	清公文发展简史·····	(519)
第五节	清公文内容·····	(551)
第六节	清公文撰制技巧·····	(562)
第七节	太平天国时期的公文·····	(571)
附录:明清公文体式·····		(582)

绪 论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产生了数量极其庞大的公文作品。以往的文学研究,对这些公文作品往往重视不够,间或在一些选本中稍加选择,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阐述,没有真正从公务文书的实用性上多加推敲,这实际上是一种缺憾。与诗歌、辞赋等文体相比较,公文作为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工具,更能反映出重大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历史上的公文名篇,或议国家大事、或论朝政得失、或攻讦时弊、或放胆陈情……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极其珍贵的思想价值。作为封建官吏的安身立命之作,很多公文写作技巧炉火纯青,在简短的篇章中,或刚柔并济、或声东击西、或投石问路、或布局巧慧、或引古证今、或巧用比喻……许多地方让我们回味无穷。

一

“公文”一词,最早见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魏·赵俨传》:“(荀)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绵悉以还民。’”《后汉书·刘陶传》也有:“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从“公文”之词出现起,其社会管理中的枢纽作用——公文的基本职能便已出现。当然,“公文”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能反映公文本身产生的时间。

事实上,作为管理公务、临民治事的工具,公文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产生的。有了公务文书赖以生存的载体,公文的出现便

成为可能。从最原始的彩陶文字和甲骨文书,到大批秦简、汉简的出现,莫不验证了公文的出现及其成熟。公文,最迟在 3500 年前即已形成。“公文”一词,在各朝各代有着不同的名目:殷商时称“典册”、周代称“中”、秦时称“典籍”、汉称“文书”、“文案”、三国称“公文”、唐宋称“文卷”、“案卷”、元称“文卷”、“簿籍”、明称“文牒”、“案牒”、清称“牌子”、“本章”等等,不一而论,而近代称得最多的是“文牒”、“文书”、“应用文”等词。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论述文学的起源时曾云:“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这里就“共同劳作”而言,似已论述了文学产生与“社会性的劳动”的密切关系,这种“社会性的劳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公务活动”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公文的历史源远流长,研究文学而忽视公文的研究,这实际上是个错误。就数量而言,在流传至今的我国古代文献中,公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现存的甲骨文、铜鼎铭文、五经之一《尚书》,到历朝历代的正史、典册、事类汇编、事略、会要、文献通考、大诏令集等;从《全上古汉魏六朝文》、《全唐文》等到《文苑英华》、《元文类》、《古文辞类纂》,莫不保存有大量的公文,唐宋散文八大家的文集中,公文也占有较大比重,欧阳修、曾巩等,公文甚至占到了 80% 多。即使是注重“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南北朝时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中,公文也占了所收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足见古人对公文的重视程度,也足见公文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这就进一步反证了忽视对古代公文的研究实际上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遗憾。

事实上,古人从未放松过对公文的研究探讨,即使是公文汇编、大诏令集、各类文选,也应是公文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先秦时把礼乐法度称为文章,如《诗·大雅·荡》序:“无纲纪文章”,似已强调文章的“纲纪作用”,即社会功用,而《史记·儒林列传》中“诏

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中“诏书律令”的作用,阐述得更是清晰。至南北朝“文”、“笔”之论,即将公文研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在《文心雕龙》文体论“论文叙笔”中所选后十篇,主要是公文。《文心雕龙·章表》也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似也非常强调公文的作用,但其偏重从辞采的角度选入公文,更多地注重形式,而未从其社会功用之角度更理性地加以探讨,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倒是曹丕充分认识到公文的作用,他在《典论·论文》中认为,文章(主要指公文)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精到。而《颜氏家训·文章》中提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里从渊源、功用上考察公文,而且摆脱了曹丕的泛泛而谈,并将公文性质与缘情之类的文学作品并列提出,进而从表达形式的区分深入到性质、功用的差异,认识进一步提高。下至隋唐宋元乃至明清,重视公文的社会功用,并由统治者有意识地汇编公文,进行公文之探讨,更是水到渠成。

1945年叶圣陶先生在《国文教学》上辑《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指出:“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其实国文所包含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叶圣陶的论述虽未明确提出“公文”一词,但重视公文意识、观念已昭著异常。在我们这个重视实用、崇尚理念的社会,研究古代公文当十分重要,学习古代公文同样是研究历史、了解社会、培养理性、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

环节。

二

公文的起源应当是与人类的文明同步发展的。早在夏、商、周奴隶制国家时代,公文撰制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早期的甲骨文、钟鼎文真实地反映了这一进程。商代专职公文撰制机构——太史寮的出现,则意味着公文撰制制度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公文的文种与体式也日渐丰富并逐步走向成熟。

《尚书》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公文选集。它所收录的最主要的六种文体:典、谟、训、诰、誓、命,代表了殷商前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公文的基本形式。虽然《尚书》中某些篇目的真伪迄无定论,但是它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如著名的《盘庚》篇,盘庚力排众议,一意迁都时,其劝说臣下的语言已具有相当的生动性。“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取喻恰当,叙事清楚,表现出公文发展的明显进步。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复杂,社会制度交替中的激烈变革,使社会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代表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公文创作队伍,他们占据了許多与公文创作和管理息息相关的职位,如楚之“左徒”、鲁之“令正”、齐之“掌书”、秦之“尚书”等,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文化修养为君主们出谋划策,向君主们进言劝谏,以达到说服人主的政治目的,尤其是诸学竞长、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使得各派士人争相奔走、摇唇鼓舌、游说四方,演绎出一个言辞酣畅、巧说纷呈、纵横捭阖的传奇时代,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和文章繁荣,为公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公文特有的色彩,清章学诚在《文

史通义·诗教上》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此话虽不免夸张，但亦可见公文在此时的繁荣程度。这一时期的公文主要集中于《战国策》、《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主要文种有策书、上书、玺书、书、盟书、檄等。其中《左传·同盟于亳载书》、《战国策·报燕惠王书》、《战国策·苏秦献书赵王》以及李斯《谏逐客书》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时代的民主气氛造就了灿烂的辞章，这一时期的公文长于雄辩、气势恢宏、文采绚丽、炫人耳目，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表现出绝无仅有的独创性和丰富性。

秦灭六国，中国出现了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秦在中央实行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首的三公九卿制，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确立了封建社会的国家公务制度。秦末战火和秦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对秦的公文创作产生了明显的扼制作用，除秦始皇、李斯等人的公文较有价值外，整个秦代公文的实际成就不高。

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短暂灭亡和“秦世不文”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的措施，为汉初社会经济和公文元气的复苏提供了保障。汉初文士多能积极参与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以秦朝覆灭为鉴，总结历史教训，提出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文景前后，公文创作远承战国余绪，出现了“西汉鸿文”的全盛局面。著名作家如贾谊、晁错等，以文陈政事，论得失，畅说治国之策，颇具战国游说之风。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守边劝农疏》、枚乘的《上书谏吴王》、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名篇。在贾谊、晁错的影响下，西汉论者辈出，极一时之盛，尤其汉武帝之后，随着国力的日渐强大，社会政治生活日渐丰富，表现在公文制作上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现了以汉武帝、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迁、赵充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公文创作名家。东汉的公文创作明显地受汉大赋的

拖累,于文辞雕饰中逐步表现出与公文实用本质相背离的趋势,虽长篇累牍,却大多空言无物。大体说来,除汉光武帝、班彪、班固、王充、张衡、蔡邕等人的成就较高外,东汉公文的成就要明显低于西汉。

汉末魏晋之际,我国公文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得汉武帝以来的尊崇儒术不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战国时期诸学竞长的局面又卷土重来,公文创作呈现出空前的自由解放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的《出师表》、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等,大多写得生动感人,文字如出肺腑。魏晋南北朝同时又是我国古代公文写作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文论著述,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公文写作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规模宏大、论旨精深、体例周详,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理论的最高成就。

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之后,隋唐时代实现了国家统一,使南北文化汇流,为社会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条件。隋代公文基本承六朝余绪,加之福祚浅薄,成就不大,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强调“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禁止“文表华艳”,但炀帝好靡丽,骈体公文仍十分盛行。唐初之始,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现象,加之唐代科举中的常举与制举都有应用之文,这就引导士子必须熟悉公务文书的写作,能写作者多可做官,做官的多能写作,公务写作的地位得以确立。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在文学上要求革新的呼声,对公文写作的时弊也有较大的冲击,加之唐太宗“上书论事”应“词理切直”的清醒认识,魏征、马周、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大批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摇旗呐喊和身体力行的写作实践,公文的散体化倾向越加明显,骈体公文也渐渐从浮靡文风中解脱出来,注意矫

正堆砌词藻的缺陷。骈体公文由形式华美向经世致用的方向转变。张说、苏頲等“燕许大手笔”的出现,则使公文呈现出昌明博大、从容洒脱的气象。中唐陆贽,则将公文推向极致,骈体公文固有的一切弊病得到根除,骈散体公文的优点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精到的公文,成了“万世龟鉴”^①,韩柳等古文大家的加盟,元稹、白居易的以身作则,则使散体公文日趋成熟、完备,骈散兼行、共同发展的公文文风已初步形成。

宋承唐制,使唐代骈散公文文风基本归于极致。尽管宋代国运衰微、积贫积弱,其武功和国力无不与威加四裔、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形成触目惊心的巨大反差,但其文化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盛唐隆宋”在公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宋代崇文抑武国策的实行,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更多的是重理智、敛个性的循规蹈矩,从而使宋代公文形成了崇尚朴实、长于说理、重实轻虚的显著特色。立国之初,扫荡骈文,复兴古文成了公文大家的主要工作。柳开、王禹偁堪称代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北宋政权最稳固与发展最快的时期,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一大批公文大家的出现,使古代公文出现了少有的繁荣局面,名篇佳制纷至迭呈,艺术技巧异常娴熟,中国公文达到了鼎盛之局面。南宋偏安,天崩地坼的巨变给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目睹战斗的惨烈,感怀国运危迫,希望抗金复国,再图大国之梦使文人士大夫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对自己身家性命的保护,犯颜直谏、饱含激情、痛哭流涕、苦口婆心的公文应运而生,汪藻、宗泽、李纲、陈东、胡铨、虞允文、陆游等大批公文大家,保持了公文勃勃发展的生机。从作品的数量、一流大家的人数等多方面看,宋代公文堪称中国公文发

① 《四库提要》语

展的高峰。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民族纷争、南北对峙的局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政权,蒙古族始终实行民族歧视和笼络并行的国策,元朝富于活力的质朴、拙野和强壮,某些文化的“异质”,与长期以来中原文化的繁缛、浮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份。元代公文中既有大量使用俚言俗语的粗俗体,也有紧承唐宋的典雅体,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白话体,形式的多样,丰富了公文的内涵,特别是元代公文制度的完善,也使元代公文在公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朱元璋攫取元末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了明朝,在政体上实行内阁制,这些均使明王朝走向了封建专制的顶点。封建中央集权的极端化,直接导致了封建文书及文书工作的系统化、严密化,明代及至以后的清代,也就成了中国古代公文的完备时期。

明初朱元璋曾有杖茹太素之举,以倡公文平实,并规定陈事不得冗言烦文,要求公文应“平实,勿以虚辞为美”,明世宗也下令,公文“务求简实”。故明代的公文多朴实晓明、文理并茂,加之宋濂、王禕、杨荣、杨溥、杨士奇、李东阳、于谦、海瑞、张居正等一大批官员的前后努力实践,形成了一大批重要的公文,加之《历代名臣奏议》、《明经世文编》等一大批公文选集的出现,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这一公文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都使公文研究成了自觉的社会意识。但总体上说,明代公文与唐宋高峰期相比,差距还是相当远的。清代建立之初,承袭明制,以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公文的写作除了内容不同而外,变化也不大,公文减繁继续强化,公文结构也更加精巧。其中太平天国时代,则使公文更接近口语化,文字更为通俗易懂。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唯我为大”的观念,大量引进了西方现代公文的形式,再加上绍兴师爷的加盟,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三大秘书体系的形